

# 云南楼阁建筑文化意蕴探析

谢 薇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楼阁在云南建筑群中既突出又富有地方民族特色。其不仅建筑形式多样,而且作为云南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云南民族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既是云南各民族宗教信仰、精神寄托的场所,也是各民族展现其文化观念、传递其自然与民族审美文化意识的外显符号,具有丰富多姿、深刻隽永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云南建筑群;楼阁建筑;建筑文化;民族建筑;文化意蕴;建筑风格

**中图分类号:**TU-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4-0125-08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4.021

##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Pavilion-Style Archit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XIE Wei

(College of Literary Art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Abstract:** Pavilion-style archit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is prominent with local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s a cruci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pavilion-style architecture has played an essential and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local ethnic culture with various forms. With the abundant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t is not only the place for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sustenance of all ethnic groups, but also the explicit symbols to show cultural concepts and to transfer the natural and ethnic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architectural complex in Yunnan province; pavilion-style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culture; ethnical architecture; cultural connotation; architectural style

云南楼阁建筑中的“楼”,属于“干阑式建筑,多是两层或多层建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楼,重屋也。”云南古代建筑一般以单层结构为主,高大的楼在云南古代建筑群中尤为突出,许多重要的建筑都是采用楼的形式。云南常见的楼,有用于城市防御的城楼、炮楼、角楼,如大理巍山、祥云、鹤庆的城楼、角楼,建水彝族纳楼回新土司衙署里的炮楼;有用于衙府的钟楼、鼓楼、过街楼,如广南壮族土司衙署里的钟楼、鼓楼,大理祥云的过街楼等;有供登临远眺的大观楼(昆明)、德化楼(大理永平)、凝秀楼(保山腾冲)等;有供演戏的戏楼,如梁河南甸傣族土司衙署里的戏楼;还有宅院、土司衙署中供人居住的后楼、配楼、绣楼等,如梁河南甸傣族土司衙

署里的后楼、配楼、土司小姐的绣楼;以及用于表彰、贞节、守志、长寿、百岁等之类的牌楼等。

“阁”亦源于干阑式建筑,也是两层或多层建筑。明人计成《园冶》云:“阁者,四阿开四牖。汉有麒麟阁、唐有凌烟阁等,皆是式。”在云南各地,迄今仍保留着“阁”的建筑遗迹,如昆明西山的三清阁、达天阁,广南的观音阁,大理的天镜阁、悬崖阁,鹤庆的清凉阁、清虚阁,楚雄的吕阁,曲靖的武侯阁,昭通永善的玉皇阁,等等。

一般而言,楼的平面较狭长,而阁的平面多方正,但在总的形制上楼与阁区别不大,因此后世楼、阁二字互通,人们习惯于将两层以上的“楼”或“阁”均通称为“楼阁”。楼阁,作为承载云南建筑文化的

收稿日期:2016-04-27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楼阁文化与文学之关系研究”(YB2014080)。

作者简介:谢薇(1964—),女,广东南海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云南民族文化研究。

一个重要元素,既是云南各民族宗教信仰、精神寄托的场所,同时也是各民族展现其文化观念、传递其文化意识的外显符号,其丰富多姿、深刻隽永的文化意蕴,值得我们作一番探究。

### 一、精神寄托的场所

“以道自重”本是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但孟子说的“枉道以从势”<sup>[1]</sup>的情形却常常发生。原因之一便是,“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的人格之外,“道”是没有其他保证的。为使“道”尊于“势”的观念得到人们的接受,就要提倡“修身养性”,给“道”建立内在的保证。而接受这一观念的人不在少数。入世重精神修养是中国古代极显著的文化特色。《淮南子·主术训》云:“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悦,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说明修身是取誉的手段,修身既与“道”的性格相关,也涉及“道”与“势”之间的关系。另外,修身也与个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息息相关。为了摆脱困境,人们不得不向外寻找“道”的客观基础,而这一客观基础之一就是楼阁建筑。在云南,楼阁建筑往往成为各民族精神寄托的重要载体,是其表达精神内涵、价值追求的重要场所。这具体体现在:

其一,益笃忠贞,诚心报国。如丽江忠义牌坊(牌楼)。该牌坊位于丽江大研古城西南隅木府,又叫石牌坊,是明朝万历年间皇帝批准建造的。其建筑所用的建材汉白玉采自下虎跳峡金沙江边,其结构的宏伟、石雕的精湛远近闻名。尤其是匾额上镌刻着明神宗钦赐的“忠义”二字,以及“风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的对联。该联出自第十代土司木泰的《两关使节》中的诗句,意指皇帝的圣旨一到,就似离太阳更近,心里仿佛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如长时间接不到朝廷的诏书,就连白云都会感到悠闲无聊,心中的失落之意就会油然而生。它彰显出木氏土司对明王朝的忠心耿耿和对国家统一的维护,把一个身处边陲之地的家族与皇家汨汨相通的关系尽显于世。而木府大院楼阁中的几处题词——“诚心报国”(1384年)、“辑宁边境”(1543年)、“乔木世家”(1560年)、“西北藩篱”(1574年)和“益笃忠贞”(1622年),均是历代大明皇帝们亲手书写。“忠义”和“诚心报国”既代表了历代皇帝对木府土

司的信任、认可,也是对其诚心报国精神“益笃忠贞”的表彰,并对纳木氏土司为节制吐蕃“辑宁边境”的“西北藩篱”寄予厚望。忠义牌坊成为各朝中央政府表彰云南地方土司,以及地方土司显示精忠报国精神的最佳场所。

其二,登高述志,写意寄情。比如昆明的大观楼。大观楼位于昆明市中区西街口,濒临滇池草海北滨,又名近华浦、谯楼。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当时的巡抚王继文路经此地,看中这里的湖光山色,命人鸠工备材,修建亭台楼阁,取名大观楼。大观楼原为二层,因面临滇池,远望西山,尽览湖光山色,蔚为大观,因而名之为“大观楼”。后云南按察史翟锦观将大观楼由原来的二层扩建为三层。大观楼上面三层,全系斗拱木质结构,四角飞檐,凌空翘首,四周棂窗,高敞明丽,整个楼形建筑精美典雅、巍峨雄壮,形似北京的天安门,属于三重檐琉璃戗角木结构。清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帝询问云南景物,侍讲学士何云彤推荐了大观楼,咸丰帝随即钦赐“拨浪千层”匾额。登上大观楼,山水凭栏望,其多姿秀逸的景色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临风抒怀、饮酒赋诗。大观楼成为当时文人骚客粉墨登场、叙情明志的场所。如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临安知府王文治《秋日泛舟近华浦》云:“忆偕诗太守,高宴集朋辈。丝竹惯珠玑,篇章出瑰怪。”这是大观楼曾经宴飨满座、作诗吟唱、丝竹优美、佳作迭出场景的逼真再现。

清雍正元年(1723年)癸卯恩科解元、工部右侍郎许希孔的《秋晚登大观楼》有:“浮云卷尽海天横,独上高楼感易生。山色西来连夕照,湖光一派变秋声。碧峤旧迹霜钟冷,白荡仙踪月舸明。指点昏鸦愁外去,疏槐秃柳不胜情。”首联写出浮云似把整个滇池卷尽,而此时独自登上大观楼很易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颌联进一步写景,湖光山色已被夕阳笼罩,滇池湖面已是一片秋色;颈联再次渲染与大观楼隔池(滇池)相对的碧鸡山麓的高峤村旧迹被一层霜所覆盖,寺庙的钟声很清冷,月光下划着木船由大观楼出滇池草海去追寻仙踪;尾联借昏鸦喻指诗人的愁情,大观楼周边稀疏的槐树、柳树都受不了诗人的愁情。此诗既把大观楼秋天的景致写尽,同时也借景抒情,情于景相融,较好地表达了诗人的情感,健拔的用语、严谨的格律令人印象极深。

清乾隆己酉(1789年)拔贡、晋宁人段时恒的《登大观楼》:“万里归来续旧游,眼前风景足淹留。天涵水面浮双塔,地涌波心耸一楼。汉将戈船斜日冷,梁王旌旆暮云愁。御怀莫问兴亡事,羨尔轻轻逐浪鸥。”万里回昆又来大观楼重游,诗人被眼前的美景所淹留,借景叙写了云南的历史:元朝云南行中书省平章蒙古族弥实创大德寺,修建双塔;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巡抚王继文在滇池畔修建大观楼;汉武帝在长安凿昆明池习船练兵欲征服昆明;湖北红巾军打进昆明城云南元代梁王逃窜楚雄。诗末,诗人还是归心于景:云南兴亡之事还是不要过问,只是羡慕海鸥轻轻追逐着浪花,无忧无虑。此诗最大的特点是把云南的四桩史实仅用二十八字就说尽,寄怀疏朗,言简意赅。

清道光甲辰(1844年)举人、候选同知、呈贡人孙清元的《春日泛舟近华浦示座中诸客》:“春来南浦草初肥,酒尽西湖客未归。花外落霞经雨湿,柳边新燕带烟飞。含情天水摇空碧,倒影楼台背夕晖。拼放扁舟载歌舞,莫令多露浥裳衣。”首联展现大观楼畔绿草初肥,诗人与友人在大观楼上纵情饮酒。颌联用花、落霞、雨、柳树、新燕、烟云等意象,勾勒了一幅春雨过后花丛外一道彩虹挂在天边,而柳树上的新燕随着烟云飞去的画面,意境深远。颈联再用拟人手法,描绘了天水含情把楼边池水浸染成绿色、大观楼倒影背满夕阳辉映的场景。这样写,把大观楼描绘得富有动感和生机。尾联又把笔触指向诗人自己,如此美景令诗人禁不住在滇池放舟,载歌载舞,忘记了露水已湿润衣裳。

而有关大观楼最为著名的文学作品,则是布衣寒士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它一扫俗唱,是云南数千年历史的感慨和抒怀的寄予。“汉习楼船,唐标玉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记录了云南的四段历史史实:“汉习楼船”,据《史记·平怀书》云,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楼船……以操习水军”,欲打通从滇池通往印度的路径。“唐标玉柱”,按《新唐书·吐蕃列传上》记载,“公元707年,吐蕃及姚州蛮寇边,九征毁緺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宋挥玉斧”,照《续资治通鉴·宋纪》曰,“北宋初年,王全斌既平蜀,欲乘势取云南,以图献。帝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元跨革囊”,依《元史·宪

宗本纪》记载,“公元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过大渡河,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皮筏以渡”。在此,孙髯将滇池风光与历史有机结合,有感而发,在写景同时触景怀古抒情。

其三,诉情对象,怀乡航标。如红河县迤萨文星阁。每有乡民外出多年,回想起家乡,远远映入眼帘的总是位置显眼的文星阁,尽管四围的村舍、田野、山岭随时光的变迁会面目全非,但文星阁作为当地游子心中的“念想”的回归“航标”,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 二、科举取士的象征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提出过“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世官制度,但此后长期却是氏族门阀制度垄断的官宦选拔制度。直至隋代实行科举考试,学识与仕途才并举。从隋代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38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止,科举制在中国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云南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乡试。这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招纳贤才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朱元璋吸取之前历朝历代取士的经验教训,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制订了一套较历代周详的科举制度,通行全国。其考试办法有大比、乡试两种。乡试以省为单位举行,中式名额由朝廷规定。大比、乡试均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在大比前一年举行。云南由于明代开始了科举考试,不仅开科取士形成制度,兴学施教风气打开,而且与对科举制度的高度热情相适应,云南自明代社会兴起了“禄星”崇拜。禄星即禄神、星神,又称“文昌”“文昌星”“禄星”。据传在北斗七星之上有六颗星,合称为文昌宫。当中的第六颗星就是人们崇拜的禄星。《史记·天官书》载:“曰文昌宫:一曰是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司禄,即指职司功名利禄的禄星。从隋唐科举制度产生后,禄星自此成为主宰士人命运的神,天下士人莫不对之顶礼膜拜。

出于对“禄星”的尊崇,云南各民族在传统乡土建筑中大兴“文昌阁”的建造之风。如大理弥渡的文昌阁(奎阁、锁水阁),曲靖会泽文庙的文昌阁,文山广南的文昌阁,红河建水文庙第五进庭院的文昌阁,保山腾冲和顺乡的文昌阁,昆明嵩明杨林的文昌阁,等等。

与禄星相似,魁星也是与科举制度有关的崇拜对象。魁星为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的俗称,指北斗七星的前四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和天权,这四星合称“魁星”,又称“斗魁”。后道教尊其为主宰文运的神,作为文昌帝君的侍神。魁星信仰于宋代,从此经久不衰,成为封建社会读书人于文昌帝君之外崇信最甚的神。

在云南各民族聚集的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楼、魁星阁(又叫文峰塔)。如大理弥渡的魁星阁,曲靖会泽文庙的魁星阁,文山广南的魁阁、魁星阁,红河建水文庙第五进庭院的魁星阁,保山腾冲和顺乡的魁星阁,昆明嵩明杨林的魁星阁,以及楚雄姚安的文峰塔等。在大理弥渡的魁星阁里,其正殿有一尊泥塑魁星造像,这魁星左手举着砚台,左脚高跷顶斗,右手握一管大毛笔作圈点状,圆眼环睁,神态威严,右脚金鸡独立,脚下踩着海中一只大鳌鱼的头部,意为“独占鳌头”。这就是传说中掌管科举选儒大权的魁星神。由于魁星神掌主文运,因此与文昌神一样,深受读书人的尊崇。“魁”又有“鬼”抢“斗”之意,故魁星又被形象化为另一张牙舞爪的形象。传说他的那支笔是专门用来点取科举士子的名字,一旦点中,文运、官运就会与之俱来。按科举制的规定,如果考中头一名进(状元),就要进入皇宫在正殿台阶正中雕有龙和鳌图形下恭迎皇榜,所以有“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之誉。

此外,“魁”还有“首”之意。依据明朝科举要实行“五经取士”(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为儒家崇奉的经典),每经所考取的头名称为“经魁”,因而“魁”有“首”“第一”之意。乡试中每科的前五名必须分别是其中一经的“经魁”,故又称“五经魁”“五经魁首”。另外,科举考试中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也称“魁甲”,乡试中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也称“魁解”,均有“第一”之意。这说明云南各民族自古就有兴学重教的传统,并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像位于昆明拓东路中段、金汁河桂林桥上的昆明状元楼(聚奎楼)就与此有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云南石屏人袁嘉谷殿试夺魁,称经济特元,属云南置行省六百多年未有之事,当年的总督魏光寿为激励三迪士子,于状元楼立“大魁天下”四字匾额,以此激励云南士子,以袁嘉谷为榜样,好好学习,求取科举,成为国家的栋梁。昆明状元楼由

此成为历代云南人求取功名的一个祭拜场地。

### 三、旌表功绩的对象

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云南各民族,自古就有惩恶扬善的传习,歌颂正义、美德、孝道等,为后人树立榜样,于是云南各民族就以建造楼阁的方式,将这种榜样的力量一代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一是旌表功绩,歌颂积极的现世精神,而为之建楼。如前述的昆明状元楼,就是因石屏人袁嘉谷考取了全国经济特科第一名,成为云南首位状元,为庆祝这一盛事,把当时在拓东路上的聚奎楼改名而成的。昆明状元楼上高悬当时云贵总督魏光寿手书的“大魁天下”的金字匾额,以纪念云南首位状元的诞生。匾两旁还挂着袁嘉谷的一副对联:“帝曰无双士,惭愧臣心,励此生古谊忠肝,窃比魏国书云,元之应雨;南来第一楼,濛回梦乡,对当前画桥驿路,更愿长卿题柱,孟博登车。”

又如,大理云龙县的诺邓村的黄氏题名坊,为黄氏家族科举题名坊(楼),镌刻有明中叶至乾隆年间黄氏家族历代举人、进士的功名。其中清代黄氏门中共出两进士、五举人及上百名秀才。康熙年间举人黄桂更是名噪一时的饱学之士,曾被誉为“滇中一儒士”。而昆明近日楼附近的忠爱坊(牌楼),则是云南人为纪念元代咸阳王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在云南的功绩而建。几个世纪以来,只要来到忠爱坊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赛典赤·瞻思丁对云南各民族所作出的贡献。

再有一个就是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红河弥勒市虹溪镇东门街中段的“三代一品封典”的石牌坊(楼)。此牌坊是为纪念朝廷表彰一代钱王王焯捐巨资效忠清廷、受清廷敕封,由王焯本人出资请通海名匠而建造的。该坊占地64 m<sup>2</sup>,高40 m,宽6 m,三重檐四柱三间,柱脚石墩有八个石狮子相对而立。坊头正中有一块镂空的石龙盘抱的直匾,上书“圣旨旌表”,下书“三代一品封典”。牌坊石柱上镌刻有三副对联:正中一副为“铁索架飞龙九重褒义来丹浩,绣章鹰翥鹤三代荣封树锦芳”,系奉直大夫、翰林院吉士加三级罗瑞图书、滇黔使者兼巡抚松潘所书;左边一副为“铁索系飞虹咸占利涉,纶音勒石柱宏奖公忠”,系云南按察使司全茂绩撰书;右边一副则为“是为仁里坊表所式,非独私门第之

光”,是中宪大夫知府四川补用同知、直隶州赵藩撰,督学使者桂林张建勋书。这些对联的书写者都是当朝的官吏,可以见出当时的官府对王炽事迹旌表的正式和规格。

二是表彰女性从一而终、坚贞不二而建的门楼(坊)。“三从四德”是古代对妇女的礼仪和行为规范的训导。“三从”作为对妇女的礼仪规范要求,最早出自《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女行为规范的要求,《周礼·天官·九嫔》载:

“九嫔掌妇女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汉代班昭在其《女戒》中这样解释四德:“德不必才明绝异,言不必辩口利辞,容不必颜色美丽,功不必工巧过人。”于此可见,三从四德仅只是封建时代对妇女从礼仪到行为的规范,是德才兼备的女性楷模的评判标准,即正身立本、语言得体、言辞恰当、端庄稳重、守操持礼、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持家。此后,随着社会风气、道德水准的变异,对妇女的行为规定更为严格,以致后来发展到为贞节女子立“贞节牌楼(坊)”,以模范、宣传、表彰其事迹,鼓励女人守贞节。地处国家边陲的云南各民族为了旌表本民族的模范女子,让其事迹永世长存,也兴建了大量的牌楼(坊),不仅有单人坊而且还有多人坊。

单人坊,如文山广南县莲城镇龙井社区西街的贞节石牌楼(坊)。它始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为旌表女教师廖悒珊而造,为青石质、穿梁式仿木结构建筑,单开间,高6m,宽5m,左右须弥座墩前后皆有伏卧的石狮。坊之顶部为仿古屋面,四角上翘,正脊透雕花草,两端吻兽。其左右坊楹联为:“里标孝德节操似翠柏苍松,台容怀清真义同冰雷铁石”。匾额下雕刻“双龙戏珠”,其他部位皆刻鸟兽、人物、花卉等图案,正反两面各置石狮一对。从其楹联可知,这位廖老师的孝德节操、台容怀清,清晰可见。而弥勒县息宰乡息宰村东北500m处,系清代监生米尔翻之妻闵氏的贞节牌坊,也是一座单人坊。牌坊为青石质,面阔6.3m,高6m,进深1.5m。牌坊重檐四柱三间,前后有蹲狮,正中刻“圣旨旌表”,雕琢精巧。米尔翻之妻闵氏的守操持正可见一斑。

多人坊,如楚雄禄丰黑井镇的“贞孝总坊

(楼)”。其位于黑井镇街尾靠五马桥头处,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慈禧太后下旨建造,不是为一个女子所立,而是为几十个女子所共立。此坊为牌楼式全红砂石质牌坊,属于四柱三间结构。额坊上镶嵌的大理石板上,正中镌刻着“节孝总坊”,右边刻“霜筠”二字,左边刻“雪操”二字。牌坊周身均布满浮雕,正中为“四龙戏珠”图案。三道门楣上用三层龙头、象鼻组成斗拱,构成12座石阙,高高托起牌坊顶部,共有龙头68个、象鼻54条。斗拱之间雕刻着“唐僧取经”“牛郎织女”“八仙过海”“二十四孝”“荷和二仙”等故事,以及各式花鸟虫鱼图案。整座坊做工精巧,造型庄重,雕刻精美,其多个龙头造型、多条象鼻、多个传说故事、各种造型图案,喻指旌表的女子事迹众多、各有其绩。

#### 四、多种宗教信仰的展现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植根于云南各个民族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它总是以其虚幻的、颠倒了某种式样反映着世界,把人间的力量幻化为祖先、神灵、佛祖、上帝等超人间力量的实体来加以信赖和崇拜,并且还用这种信仰和崇拜来支配着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规范着自身的行为。”<sup>[2]48</sup>云南是个多宗教信仰的省份,本土宗教、外来宗教在这里并存发展,而为了彰显和宣传宗教教义,云南各民族纷纷兴建各种宗教建筑来吸纳信众,传播宗教文化。

##### (一)佛寺中的楼阁建筑

佛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云南,不仅派系齐全、宗支繁多,而且不同民族信奉不同的佛教派系。佛寺中的楼阁建筑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

##### 1. 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楼阁建筑

公元7世纪传入云南的汉传佛教,其禅宗在公元13世纪在云南盛行,分布于昆明、玉溪、曲靖、大理、楚雄、保山、红河、昭通等地。除了在汉族中有广泛影响外,部分纳西族、白族、彝族也信奉汉传佛教。云南现存的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楼阁建筑有昆明筇竹寺的华严阁,昆明圆通寺的圆通胜境楼(坊),昆明西山华亭寺的观音楼、撞钟楼、藏珍楼、藏经楼,昆明西山太华寺的望海楼(碧万顷楼),大理感通寺的写韵楼,鸡足山祝圣寺的钟鼓楼、藏经楼,建水指林寺

的藏经阁、准提阁、蒙自的玉皇阁(通明阁),武定狮子山正续寺的藏经楼,等等。如鸡足山祝圣寺,其藏经楼、藏珍楼、钟楼、鼓楼为重歇山式构造,飞檐斗拱、门作户壁全出自大理剑川、鹤庆白族艺人之手,其造型独特,雕琢精致。大雄宝殿后的藏经楼内藏各种“钦赐”或化来的珍贵佛教经典,其中有光绪赐虚云大师的三藏大乘真经,万历十四(1586年)、十七(1589年)、二十九年(1601年)钦赐的大藏经,慧辉和尚携标荷经四年募化的正藏三百三十函。不仅藏经,藏经楼同时也是讲经说法之处。而藏珍楼则藏有紫衣、钵具、锡杖、如意、缅甸卧佛、碧玉观音等。此外,祝圣寺天王殿后庭院左边还建有钟楼,楼下立有达摩祖师的塑像。庭院右为鼓楼,楼下塑有地藏像。祝圣寺的这些建筑楼阁可谓云南保留汉传佛教典籍和佛具最多的楼阁,也是汉传佛教在云南大理白族地区传播的明证。

## 2. 南传上座部佛教佛寺中的楼阁建筑

南传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又分为润、摆奘、朶利和左抵四派。公元13世纪由泰国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德宏、临沧、思茅(今普洱)等地区,系云南所独有,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民众所信仰。小乘佛教在傣族地区影响最大,“不但傣族男子,要到寺院出家,做一段时间的僧侣,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每逢重大事情,如出生、赐名、结婚、远行、盖房、生病等,都要请僧侣来家念佛诵经”<sup>[2]56-57</sup>。小乘佛教在云南拥有大量的佛寺,佛寺里建有许多功能各异的楼阁。譬如,西双版纳勐海县曼短佛寺的哄坦(藏经楼)。其建于公元950年,建筑为拍梁、穿斗结合的梁架结构,重檐歇式屋顶,上下两檐都是五面坡、墙抬梁、墙体与檐口间设有斜撑,内外构件上均有龙、凤、花卉等雕刻图案装饰,逼真形象,原始古朴,建筑造型和装饰艺术均集中体现了傣族古代建筑技术的精华。哄坦内不仅收藏有贝叶经、手抄佛教经典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民间文学抄本,而且也是傣族子弟、僧侣学习经文的场所。又如,景洪市的曼阁佛寺中的鼓房(鼓楼)。该鼓房建筑结构是木穿斗式,有巨大的牛皮鼓置于其中,每月逢七、八、十四、十五的傍晚,就会击鼓鸣锣,目的是为了“镇住路南山上九千九百魔鬼”。这反映了傣族信仰中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早已与佛教混杂一起,成为傣族信众信奉的宗教,鼓房也成为傣族佛寺中必

不可少的部分。再有,瑞丽市的大等喊寺。整座奘寺属于三层歇山顶重檐楼,左右是两间重檐顶阁,穿斗走廊与阁相连,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传说佛祖传经布道路过此地住了一夜,信徒为纪念佛祖而修建了此寺。

除此之外,还有普洱景谷县的迁糯佛寺(汉名清佛寺)。此寺山门是仿内地汉传佛教的形制,高18m,宽7m,正面设三道门,中为大门,两边各一侧门。其整体为牌楼结构,上段为木质,下段为石质基础,底部为须弥座支撑牌楼,顶部为三重檐,覆盖青灰瓦,檐角上翘。牌楼中有用汉文书写的“清佛寺”三个大字的匾额,字体工整严谨,其右侧刻着“田糯和尚乡官合修”的鎏金字,左侧则为“乾隆戊戌季春谷旦”字样,重檐下还有龙、云纹等浮雕。另外,该山门内面的牌楼上用汉文书有“福贵门”三个鎏金大字,预示着进这寺门朝拜皈依的傣族人“福贵”。从山门结构、浮雕及文字可以看出,此寺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是云南境内少见的汉傣建筑文化相融合的典范,也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教徒皈依佛的圣地。此外,云南临沧耿马县的耿马总佛寺的藏经阁,也是一座汉傣建筑文化相融合的楼阁。该楼阁藏经227部45卷,由于处于边境的特殊位置,成为了耿马土司及其亲属拜佛朝圣、海外侨胞回乡探亲访友,以及修坟祭祖、供斋滴水、诵经做爨、敬供腊条香花的场所。

## 3. 藏传佛教的楼阁建筑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经由西藏传入云南,主要在迪庆的藏族、丽江的纳西族、摩梭人,怒江的怒族、傈僳族、普米族中间传播。“藏传佛教的支系特别庞杂,有格鲁派(黄教)、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还有古老的本教残余‘黑本’和‘白本’。单‘噶举派’就有‘四大八小’等支系。‘四大’中的‘噶玛噶举派’,又有两个活佛系统:一个是黑帽系,一个是红帽系。”<sup>[2]</sup>在云南的藏传佛教建筑中,香格里拉松赞林寺(汉名归化寺)的佛教寺庙群最为典型。其主要建筑为五层藏式碉楼,主殿上层镀金铜瓦,殿宇屋角兽吻飞檐,又具汉式寺庙建筑风格,下层大殿有108根柱楹,代表佛家吉祥数,左右墙壁为藏经“万卷橱”,顶层正楼特设经舍佛堂,供奉五世达赖、七世达赖佛像以及贝叶经卷、唐卡、传世法器。佛

堂正南为高耸的钟鼓楼,清晨、正午、黄昏击鼓报时,声闻十里。“松赞”指天界三神帝释、猛利和娄宿游所,“林”即寺。松赞林寺可理解为一切显密非一次修成,为使无垢之法源尖不断地惠及众生,使之圆满,特建此寺。香格里拉除松赞林寺外,还有红被寺、东竹林寺、德钦寺、书松尼姑寺、叶日尼姑寺、扎加寺、扎钦寺、扎史取里寺、哲母寺、觉顶寺、茂顶寺、布顶寺等,其楼阁建筑风格亦大都如此。

就云南的藏传佛教寺庙而言,丽江的福国寺也值得一提。其最早为木氏土司的家庙,公元1679年木氏土司木懿从青海请来都知等喇嘛,将其改建为有经堂殿宇五大院、僧房十八院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寺院,藏名“奥明南卓林”,意为“色究竟天解脱林”。该寺院中的大殿“五凤楼”(又名法云阁),其建筑极为精美,高20 m,为三层八角飞檐楼阁,上中下共有24个啄天飞檐,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均像五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五凤楼”也因此得名。其珍藏的噶玛巴活动的圣迹和文物,为藏传佛教的珍品。除此之外,在丽江藏传佛教楼阁建筑还有指云寺的大殿。其为三重檐楼阁,寺顶覆瓦,为四方形钻尖顶阁,底层为法堂,上两层为藏经楼,六根高12 m的通天京柱高耸其间,东西南北十二角雕龙画凤飞檐欲博九天,内外檐装皆精工镂雕、彩绘。其殿宇巍峨、富丽、气势非凡,明显不同于松赞林寺的碉楼式建筑,体现出汉、藏、白、纳西建筑艺术交融的特色,也说明木氏土司对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视。另外,云南藏传佛教寺庙还有丽江的文峰寺、玉峰寺、普济寺,维西的兰经寺、寿国寺、达摩寺、来远寺、达来寺,怒江贡山的普化寺,等等,这些藏传佛寺的楼阁建筑也具有同样的特色。

## (二)道观中的楼阁建筑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宗教的道教,在其创立的三世纪初便由四川传入云南,南诏时期渐渐兴盛,明代后在云南进入全盛时期:一是长春派创始人刘渊然入滇传教;二是奏请朝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地”<sup>[3]</sup>;三是全真派一代宗师张三丰入滇传教。进入清代,云南的崇道活动仍保持着兴旺。

位于昆明西山区罗汉山的三清阁,是著名的道教建筑群,包括灵官殿、老君殿、飞云阁、真武宫、玉皇阁、达天阁等共九层十一座木结构宫观建筑。

“三清”又称三清天、三清境,是道教三十六天仅次于大罗天的最高境界。三清阁内供奉着天宝君、太上老君、太上道君三个道教信奉的尊神。三清阁高出滇池三百多米,各殿、宫、阁缘山壁而上,层层叠叠,高低错落。灵官殿是三清阁的第一殿,建于明嘉靖年间,为昆明西山唯一明代建筑。其重檐歇山顶,通面阔三间6.8 m,进深三间6.5 m,平面略呈正方形,檐下无斗拱,当心间四根通柱直贯屋顶,支撑整座建筑。三清阁真武宫与玉皇阁皆清道光年间建,斗拱繁缛,出象鼻昂,每年元月九日昆明民众都要来此谒拜。

云南大理巍山彝族信奉道教,在巍宝山建有玉皇阁、魁星阁、斗姆阁、培鹤楼、天师楼等道观建筑。玉皇阁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依山而建,层层而上,每层以三路石级相通,共42级,由四圣殿、玉皇殿、天师殿、三师殿、吕祖殿、依云阁等建筑组成,内供奉天地水三官、吕祖、财神等,阁内天花板上绘有10幅图,其中一幅是道家“水火匡廓图”,采用黑白两种颜色,用宽细线条合半交错的手法绘成,是道士长生不老丹的药方示意图。巍宝山是中国南方五斗米道的传教区之一,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到十五日的朝山庙会都在此举行,并演奏道教音乐,为云南传播道教文化的重要场所。

## (三)清真寺中的楼阁建筑

公元1253年,忽必烈军占领大理后,留下驻守云南的士兵中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这些中亚人成为元代最早进入云南的回族。公元1276年,皇子忽哥赤被封为云南王,许多回族也跟着进入云南,在昆明、玉溪、大理、丽江、保山、腾冲居住。到了明代又有大批回族跟随移民迁入云南,留籍于滇南、滇西一带。而清代进入云南的回族,则定居于滇东北地区。云南境内的回族聚居区,大多建有供做礼拜用的清真寺。云南清真寺中的楼阁建筑大都呈现出传统殿堂式、阿拉伯式等建筑风格,较好地综合了当地的多种建筑元素。例如,建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开远清真寺的大门,为重檐歇山顶牌楼式建筑,由三道门组成,正门有较大的石狮一对,雕刻精美,左右两侧门各有小石狮一对,形如正门石雕,院内左侧有三重楼六角攒尖顶的木构宣礼楼(拜楼)一座,显现了当地楼阁的典型特征。另外还有

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鲁甸拖姑清真寺中的唤醒楼(拜楼,即呼唤快来礼拜之意)。该楼高约20 m,共五层,由46根圆柱撑起层层叠叠的梁宇,二层楼檐正中悬挂一匾额,刻有草书的“普慈万有”四字,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镇守云南昭通镇雄等处总兵冶大雄刻制,楼内对联“层图重辉,华树赠益”形象地概括了唤醒楼的实貌和特色文化。

### 五、自然与民族审美的融合

云南各民族的楼阁建筑,强调大自然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第一,人工与自然的过渡与融合。云南的楼阁建筑往往把自然纳入其中,成为楼阁建筑的一部分,以寻求人工之美与自然之美的有机统一。如昆明西山区罗汉山的三清阁。据民国年间袁嘉谷《游西山记》记载,“品茗三清阁,阁,山之名胜也。吴梅村诗‘碧鸡台榭乱云中,旧是梁王避暑宫。’宫即阁也。明时为北庵诸迹之一”。三清阁位于太华山南面,其罗汉山由北向南眺望,山形外廓酷似大肚弥勒。三清阁九层十一阁道观建筑群,依地势造型,整座建筑群层叠嵌缀于悬崖绝壁之上,绿树贴壁探海,亭阁钩心斗角,雕梁画栋,上出重霄,下临无地,形成南北庵上下两层壁危楼建筑群的“悬空”险境,道家神仙的空中楼阁俨然眼前。其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是对“天人合一”理念的最好诠释。又如云南勐海县曼短佛寺的哄坦(藏经楼)、景洪市曼阁佛寺的鼓房(鼓楼)、景谷县迁糯佛寺(汉名清佛寺)的山门等,都是建在寨边地位显要、自然风光极佳之处,重视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四围的竹枝树影更是平添了一种神秘而迷人的氛围。再如云南大理巍山彝族在巍宝山修建的玉皇阁、魁星阁、斗姆阁、培鹤楼、天师楼等道观建筑。这些道观建筑分布于前山和后山。前山叠嶂绵延,宫观掩于密林之中;后山陡峭险峻,楼阁多傍山势显露于岩壁之间。这种时藏时露的楼阁建筑布局完美地体现出道家提倡的“道德自然”的观点。

第二,注重生态环境与人生经验的关系。云南傣族、纳西族、彝族等楼阁建筑的基址都严格按照风

水理论的藏风纳气、阴阳运转、五行和谐来选择,开门、朝向、高低、装饰有诸多凶吉的讲究,同时融合山水走向、形态、大小远近以及地形、水文、植被等考虑,不但重视生态环境的物理质量,而且注重对山形水系审美价值的提升,将人生的福、禄、寿、喜、兴旺、腾达等经验浸入楼阁建筑风格之中,体现出云南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领悟。如丽江福国寺的五凤楼,沿山势建于寺内山门石阶之上,楼正面濒临黑龙潭水,背面借黑龙潭北面的山峰之景,山水互相映衬交错,完美融合为一体,真正应和了五凤楼匾额“天光云影”的深邃意境。该楼中明、暗间格门上雕牡丹、梅花、石榴等图案。牡丹祈“富贵有余”,梅花祈“福”“禄”“财”“喜”五福。而楼顶天花板绘有太极图、飞天神王、龙凤呈祥等图案。“太极图”俗称阴阳鱼,显示出纳西族重视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与自然融合协调的环境意识;“飞天神王”喻指神通广大、应有尽有、法力无边等含义;“龙凤呈祥”喻指祥瑞、喜庆、高贵、华丽等意义,与汉族提倡的龙凤文化内容不谋而合。

第三,楼阁建筑所用材料均取材于自然。如丽江大研古城西南隅木府的忠义牌楼所用的汉白玉,采自下虎跳峡金沙江边;楚雄禄丰黑井镇的贞孝总坊(楼)建筑所用材料为当地的全红砂石。除此之外,文山广南县的贞节石牌楼所用青石材,香格里拉松赞林寺所用土料,丽江福国寺五凤楼所用木材等,无一不是取材于自然。这些自然材料的采用,体现了质朴、简约、天然的意蕴,暗含云南各民族与自然相融契合的愿望和追求。

总之,云南各民族的楼阁建筑,彰显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参考文献]

-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9.
- [2]张保华.云南民族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3]陈垣.道家金石略·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2.